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形成及其方法论意义

李双套

【摘要】回溯和总结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形成中的历史经验、标识性成果和方法论架构,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创造和话语表达,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哲学思想演进的历程中,哲学革命与话语革命是双向互动的,哲学革命以话语革命为依托,话语革命以哲学革命为基础。马克思通过扬弃思辨哲学话语、将经济学话语哲学化、甄别和放弃直观唯物主义话语、生成实践话语等过程,既完成了哲学革命,实现了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也完成了话语革命,实现了理论话语到实践话语的转向。马克思创建实践话语的历史过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关键词】话语体系建设;哲学革命;话语革命;马克思哲学话语

【作者简介】李双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24.3.30~3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研究”(编号22AKS00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热点。在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中,回溯和总结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形成中的历史经验、标识性成果和方法论架构,从马克思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创造和话语表达,可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话语革命与哲学革命之间往往呈现为双向互动的关系,哲学革命以话语革命为依托,话语革命以哲学革命为基础。哲学创新一定伴随着话语创新,它既可能是新话语的出现,也可能表现为旧话语的新阐释。“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页);反之,“术语的革命”也会推进一系列“新见解”的形成。探讨马克思哲学革命与话语革命的辩证关系,既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所创建的新话语,也有

利于我们从这套新话语出发理解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革命。考察马克思哲学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从其话语革命管窥其哲学革命。一方面,以马克思哲学话语变迁史为地基,可以重新清理马克思走出黑格尔哲学谱系的历程,深入辨析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另一方面,以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为参照,可以从新的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即经过扬弃思辨哲学话语、将经济学话语哲学化、甄别和放弃直观唯物主义话语、生成实践话语等过程,马克思既完成了哲学革命,也完成了话语革命。

一、“从问题开始”与思辨哲学话语的扬弃

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课题中,“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2页),这是哲学研究中应秉持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起,始终聚焦社会现实中真正的时代问题,并致力于解答人类

实践活动中的各种难题。马克思建构哲学话语的过程正是从问题开始,在触及物质利益难题后,他开始反思思辨哲学及其话语体系的弊端。与“从问题开始”相应,作为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话语必然要以体系的方式出现,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点是概念和命题,特别是概念。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就认为,“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文德尔班,第16页)。而概念本身具有自身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这是概念不断被阐释、被理解和再创造的过程。因此,要从概念发展史(即概念的前后衔接)来理解概念,进而探讨话语。对马克思哲学话语的考察,同样需要以概念为突破口。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指向青年黑格尔派及其哲学基地(即黑格尔哲学)。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话语变迁,需要把马克思哲学置于同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对话”中。不管对马克思哲学作何种解读,都不可动摇其“超越黑格尔哲学”这一关键内核。理念论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根基,黑格尔认为,“当我们把思维认为是一切自然和精神事物的真实共性时,思维便统摄这一切而成为这一切的基础了”(黑格尔,1980年,第81页)。黑格尔哲学延续了柏拉图主义以思辨方式把握世界的基本主张,确立了理念本体论的哲学地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同上,“导言”第38页),是通过逻辑把握世界,“意识的真实内容,一经翻译为思想和概念的形式,反而更能保持其真相,甚至反而能更正确的认识的见解”(同上,“导言”第41页)。与思辨哲学相伴随的是一整套思辨话语,如“意识”“自我意识”“精神”“理性”“思想”“实体”“理念”“知识”“绝对理念”“实在性”“逻辑”“思维”等。

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尝试突破黑格尔哲学及其话语。他认为,“真正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将无限者认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认作非有限者,

认作无限者,换句话说,就是将有限者化为无限者,而将无限者化为有限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7页)。《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延续了费尔巴哈关于“真正的哲学”的思考,把哲学革命和哲学话语的创新问题放在了“真正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差异化中去求解。他认为“真正的哲学”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并将“真正的哲学”视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220页)从表述来看,马克思关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表述与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1961年,“序言”第14页)非常类似。但如果深入到这一命题的内部,即可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原则高度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时代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而黑格尔所理解的时代并非直观的、感性的当下现存,而是理念中的时代,时代的本质性规定是理念,时代是绝对精神实现了的自身。因此,所谓哲学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220页),在马克思这里主张“接触”的是“存在”,而在黑格尔那里主张“接触”的是“精神”。马克思认为需要通过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实现哲学与时代的“接触”,所谓“内部”就是通过哲学“自己的内容”,而“外部”就是通过哲学“自己的表现”;而且,“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参见同上,第220页)概念可以说就是哲学的外部表现,哲学正是通过这些外部表现来呈现“自己的内容”。黑格尔在批评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重新端出,以飨大众”时强调,“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和正确的概念”。(参见黑格尔,1961年,“序言”第3页)那么,如果要建构“真正的哲学”,就需要从“真理”和“概念”出发。顺着这一逻辑,马

克思提出用新的话语建构“真正的哲学”的思路。

《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用新的哲学话语建构“真正的哲学”的发端。此时,马克思开始扬弃思辨哲学话语,已经很少直接使用思辨哲学概念,并提出“消灭哲学”的任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0页),而“消灭哲学”自然是通过消灭哲学所依存的话语来实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消灭哲学”的任务,是因为思辨哲学沉浸于抽象的思辨和纯粹的逻辑,把话语与产生话语的人分割开来,置现实的人于不顾,将出发点设置为“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同上,第514页),成为“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同上,第331页),以致“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同上,第515页)。马克思“消灭哲学”的目的在于突出现实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关于“真正现实性”(同上,第3页)的话语。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真正现实性”主要关涉政治和宗教,他是通过政治批判话语和宗教批判话语来酝酿自己的世界观的。

一方面,马克思借用并改造了一系列政治批判话语来超越思辨哲学话语。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借用了诸如“人的世界”“回归于人自身”“现实的苦难”“被压迫圣灵”“现实幸福”“苦难尘世”“人的自我异化”“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整个的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人的高度”“人的根本”“解放人民”“彻底的革命”“人的解放”“普遍解放”“人的完全回复”“消灭自身”“人的关系”等话语,并对这些话语进行了哲学改造。依托这些话语,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如“人创造了宗教”(同上,第3页),“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上,第11页),“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同上,第14页),“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同上,第17页)等。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宗教批判话语来超越思辨哲学话语。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世俗问题,“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同上,第27

页),世俗局限性即政治解放的限度。也就是说,犹太人即使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也只是实现了政治解放,他们仍然未达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同上,第11页)的高度——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所以,犹太人问题不仅是犹太民族、犹太教的问题,而是“当代的普遍问题”(同上,第25页),也就是如何实现“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同上,第46页)的问题。如何才能“回归于人自身”呢?马克思认为要从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转向揭穿“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从对“天国”“宗教”和“神学”的批判转向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参见同上,第4页),由“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同上,第45页)转向“现代的自我解放”(同上,第49页)。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尚未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中去。只有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时期,马克思才意识到“宗教、哲学、道德”都属于意识的“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并不具有第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参见同上,第544页)

当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已经通过政治批判话语和宗教批判话语来酝酿自己的世界观,但其哲学革命与话语革命尚处于发端时期。从哲学革命来看,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即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完成了宗教批判。他在《神圣家族》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上,第342页)。这表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给予了过高评价,也说明他尚未站在唯物史观角度认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时期,马克思才首次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来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宗教观。从话语革命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借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大量表述和话语。麦克莱伦(D. McClellan)就指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关宗教的论述“所使用的几乎全部比喻都是

从鲍威尔那里借用来的”(麦克莱伦,第80页)。譬如,(1)“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来自鲍威尔。鲍威尔在《自由的功绩和我的事业》中说,宗教“在它那充满破坏性,上了鸦片瘾似的迷醉中侈谈一切都将焕然一新的来世生活”(麦克莱伦,第81页)。(2)把宗教比喻为“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同样来自鲍威尔。鲍威尔在《对观福音书作者批判》中说:“人的精神在这些宗教(自然宗教)仪式中套上的锁链是用花朵环绕着的。”(麦克莱伦,第81页)(3)“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也来自鲍威尔。在《被揭穿了了的基督教》中,鲍威尔认为宗教是一种“虚幻的反映”,宗教是“异化了的人”或“非人性的人”的自我意识。(参见麦克莱伦,第80页)(4)“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及“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同上,第4页)等也都来自鲍威尔。这一时期,马克思仍然在使用传统思辨哲学的话语和命题,如“人的本质”“类存在”“类生活”“类关系”“类存在物”“异己的本质”“感性的现实性”“人的最高本质”等话语以及“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命题。虽然这些话语已经不是马克思话语的主流,但仍然是马克思借以论证自己学术观点的重要资源。

由上可知,一方面,马克思已经开始使用政治批判话语和宗教批判话语扬弃思辨哲学及其话语,这表现出马克思哲学话语对思辨哲学话语的突破;另一方面,对思辨哲学及其观点的借用和高度评价,又反映出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局限,这两者之间彰显出巨大张力。这一时期,还谈不上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话语的彻底转向,但是他所开启的“真正的哲学”及其话语的变革方向是正确的。

二、“研究借鉴”与经济学话语的哲学化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

研究借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1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重要之维。

马克思在建构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大量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譬如,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以社会现实问题(宗教问题、犹太人解放问题)为切入口,深刻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而在《手稿》中,马克思则开始直接批判黑格尔哲学本身,并专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展开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学界不仅将其解读为马克思对作为思辨哲学特殊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还将其解读为马克思对作为哲学一般的整个柏拉图主义、全部形而上学、整个传统哲学本体论及其解释原则、思维方式的批判。(参见吴晓明,第90页)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存在双重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黑格尔把“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3页)作为世界的尺度,颠倒了现实世界与哲学思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这一错误在《精神现象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第196页)视为精神的异化史,把抽象的思维奠基在感性的生活世界之上。与此相联系,黑格尔的第二个错误在于,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的设定和扬弃变成了“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同上,第203页),所以也就把感性世界中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视作思维的历史。因此,把对人的本质力量、对感性现实的占有同样视为“在意识中”或“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同上,第203页)实现的占有,把现实的、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历史活动变成了“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从“意识”出发,到“绝对知识”结束。可见,黑格尔哲学延续了整个西方哲学追求终极存在,并以这个终极存在作为解释原则的传统,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错误也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错误,黑格尔哲学“汇集了思辨的

一切幻想”(同上,第213页)。这是马克思对《德法年鉴》时期思想的延续,那么,如何对黑格尔哲学话语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话语进行突围?在扬弃思辨哲学话语的基础上,马克思采取的另一方法策略就是引进经济学话语。

《巴黎笔记》完整地呈现了马克思初次接触经济学的过程。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以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等人的理论为依托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并“通过人本主义的哲学话语掌握了经济学研究的话语,实现了论说‘自由’”(吴婷,第48页)。马克思首先借用了“劳动”这一经济学研究的话语。“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常用概念,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都将“劳动”作为核心概念加以论述。最早把“劳动”概念引入哲学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接受了斯密的劳动思想,并将其劳动概念作了哲学化的思辨表达。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黑格尔,1961年,第238页),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劳动”并不是斯密意义上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劳动”,也不是斯密所划分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而是绝对对精神意义下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而且黑格尔以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来阐释劳动,他没有看到劳动奴役人、导致人的异化的一面。而马克思则“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研究,一方面存在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原文的摘录和在此基础上的评论中,他摘录和评论了萨伊、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观点。在这些评论中,马克思尝试解答了“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另一方面,马克思结合哲学概念“异化”,把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进行了创造性融合,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认为存在着一种理想性本质,并以此作为标准和方向,将现实存在与此本质相对照,揭示出存在与本质的分离,从而宣称存

在的不合理性,也揭示出本质作为存在的方向,号召人们对存在加以改变,从而趋近本质。马克思将现实存在与本质的分离称为“异化”,他认为异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政治异化、经济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和精神异化等,而异化劳动是所有异化的基础和核心。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起点建构出一套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范式,并在《手稿》中将此范式付诸实践。他首先设定了一种理想性的劳动,并将之视为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同上,第162页)。马克思使用了一系列与这种理想性活动相伴随的话语,如“劳动的现实化”“劳动本质”“自主活动”“自由活动”“真正人的”“合乎人性的”“人的本质”等。然后以这种理想性劳动为对照,马克思认为“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同上,第156页)表明劳动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劳动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及“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参见同上,第125页)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了“人的世界的贬值”“畸形”“愚钝”“异己的存在物”“对象的丧失”“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受动”“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偏差、缺陷”“工业的宦官”“病态的欲望”等话语来描述这种异化状况。最后,马克思设想消除了异化劳动后建立起的人向理想性劳动复归的共产主义状态。譬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作为“完整的人”以“全面的方式”对“人的本质”“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占有。与此相关,马克思建构出“扬弃”“真正占有”“完全的复归”“真正解决”“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本质力量的确证”“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反映人摆脱异化的话语。这就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理解为“理想-分离-理想”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当然,从“异化”到“异化劳动”的历程,从哲学话语到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的融合,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也是马克思在扬弃思辨哲学及其话语以后实现的思想转向。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借

用一系列相互具有有机联系的概念,借用一个真正的总问题,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这表明了作者的立场”(阿尔都塞,第30页)。但是这种思想转向仍然是不彻底的。一方面,马克思虽然深刻批判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个思辨哲学的内容和话语,也已经意识到单纯哲学批判的局限性,并将经济学话语引入到哲学中;但另一方面,在如何建构“真正的哲学”的问题上,他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和话语体系仍然具有思辨性,又陷入到形而上学之中。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跃出“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他在《手稿》中批判思辨哲学及其话语的思想资源仍来自费尔巴哈哲学。譬如,马克思在设定理想性劳动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资源主要是“类”范畴,如“类能力”“类特性”“类关系”“类意识”“类活动”“类行为”“类存在物”“类生活”“类本质”等,而“类”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费尔巴哈看来,“类是人的自然、本质”。(参见侯才,第58页)在“类”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等具有费尔巴哈哲学性质的命题。所以,从哲学话语角度来看,《手稿》与《德法年鉴》具有一致性。马克思甚至认为依托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即可完成对传统思辨哲学及其话语的彻底批判,因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严肃的、批判的态度”,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问题上“作出了真正的发现”,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参见同上,第199页)事实上,费尔巴哈哲学仍然是思辨哲学,没有克服黑格尔哲学,甚至可以说只是黑格尔哲学的“变种”。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过高评价即显示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没有达至准确认识,也反映出马克思没有完成对自身哲学信仰的清理。在此情况下,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创新。在这里,可以看出《手稿》中呈现出的马克思思想的悖论:用思辨哲学的“变种”批判思辨哲学本身,或者说用一种特殊的思辨哲学批判作为一般的思辨哲学。可见,在《手稿》中,经济学概念是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助推器,但是马克思思想演变的结果

尚未呈现出来。当然,对经济学术语的借用并不仅存于《手稿》时期,而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对经济学话语的哲学化处理,也是对哲学话语的经济学化处理。在马克思思想演变的过程中,经济学话语的哲学化和哲学话语的经济学化始终融合在一起。

三、“批判精神”与直观唯物主义话语的甄别和放弃

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18页)、“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61页),即不要以直观的方式对待理论、概念、话语和方法。当前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样“要有批判精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1页),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建构哲学话语的过程中,马克思就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话语。从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话语革命来看,对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的超越比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的超越更为艰难。因为纵然费尔巴哈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具有“家族相似”性,但费尔巴哈哲学为马克思认识宗教问题、犹太人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作为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在话语形式上与黑格尔哲学又呈现出原则性区别。在此意义上,只有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对其思辨性进行揭露,才谈得上马克思对全部形而上学及其话语的终结。

从形式上看,费尔巴哈哲学从属于唯物主义谱系,体现为他用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在使用“类”范畴的同时,已经表现出同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差异。费尔巴哈试图用“真正的哲学”超越“思辨哲学”,并“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2页)。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提出“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同上,第102页),并使用了“感性”“实践”“直观”“存在物”“存在”“感性存在”“现实存在”“感性直观”“感性客体”“感性的具体

存在”等新话语与思辨哲学话语相对立。他还提出要用“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超越“无限者”“上帝”“绝对”和“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用“感觉”超越“思想”，用“经验”超越“思辨”，用“感性世界”超越“超感性世界”，用“现象的世界”超越“本质的世界”，用“直观”超越“思维”，用“感觉对象”超越“抽象的思想”等。

从内容上看，费尔巴哈强调现实性原则。现实性原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特点，他将“现实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即“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与思维共存的或与思维同一的对象，只是思想”（同上，第166页）。费尔巴哈研究的是“感性客体”，而不是“思想客体”，他用感性和对象性来标明“感性客体”的现实性。他提出，与那种离开感性而借助抽象思维来逻辑地虚构或想象抽象世界的旧哲学完全不同，“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同上，第169页）。基于对感性原则的强调，费尔巴哈提出了哲学的基本方法，即“感性直观”。他说：“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同上，第108页）费尔巴哈所说的“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并非经验性的表象直观，而是比表象和幻想晚出的“直接的感性直观”。在他看来，“直接的感性直观”意味着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下了解事物，思维则是在最狭隘的意义下了解事物”（参见同上，第179页）；因为“直接的感性直观”能够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能够“在事物中看见事物本身”。（参见同上，第174页）

由上可见，费尔巴哈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展现出了唯物主义性质；如果只从字面意义理解，完全看不出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的思辨性。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是唯物主义内部的不同谱系

之争。费尔巴哈提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同上，第115页）。如果仅以是否超越唯心主义这一标准来识别，我们无法区分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因此，不能仅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界来认识马克思思想与费尔巴哈思想的差异。可见，在妨碍马克思“真正的哲学”及其话语的构建方面，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话语比黑格尔思辨哲学话语的危害性更大，因为马克思以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为基础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已经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

在《提纲》中，马克思开启了对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思辨性的甄别和剖析。《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也是包含着马克思新话语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在话语构建上已经跃出费尔巴哈哲学，开始使用“实践”“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真正人的活动”“实践的问题”“实践的思维”“革命的实践”“改变世界”“人的感性的活动”等话语。当然，尽管马克思提出了新的话语和概念，但是尚未对这些概念展开具体阐释和充分论证。这也启示我们，话语本身的形式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使用这些话语想要表达何种观点。对话语的认识要深入到话语背后的理论体系中，离开了思想的整体性就无法把握话语的准确内涵，“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黑格尔，1980年，第55页）。所以，要揭示出费尔巴哈哲学话语的思辨性，只有揭示出其所依托的“全体”的思辨性才能实现。哲学话语是表达哲学思想的概念和命题，因此识别哲学话语的性质需要从识别话语所依托的哲学的性质入手。费尔巴哈并没有跳出对感性事物进行逻辑学把握的窠臼，他用以与抽象对立的感性形式仍然是一种抽象。他认为，“我们只需要不将理智与感性分开，便能在感性事物中寻得超感性的东西，亦即精神和理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

集》上卷,第174页)。只要剖析出费尔巴哈哲学中“感性事物”“感性直观”与“理智”“精神”“理性”的同质性,那么其哲学及话语的思辨性便昭然若揭,而这一任务的彻底完成是在《形态》中实现的。

四、“实践”话语的阐释与实践哲学话语的生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正是将实践作为核心范畴,并对之加以正确阐释,马克思哲学话语才得以正式出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革命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对“实践”话语的阐释与对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非实践性”的批判直接相关。费尔巴哈“感性事物”“感性直观”的“非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费尔巴哈离开“人的活动”来抽象地谈论人。虽然费尔巴哈强调现实性原则,以“感性-对象性”来规定人,从而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但是他并没有把人理解为从事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的人,从而剥离了人的活动性和历史性,导致依然停留于抽象的“人”的概念。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没有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他把解决“理论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的任务仅仅看作理论自身的任务,没有想到以实践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虽然费尔巴哈也把自己视为共产主义者(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35页),但他的学说里毫无推翻现存不合理世界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的革命思想。因此,当他看到“大批患瘰癧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时,不是求助于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而是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试图用直观和观念上的平等代替现实的革命,以解决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这样他又“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与费尔巴哈相反,“实践”在马克思学说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的活动”作为解释原则,从而确立实践原则的本体论地位。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在批判性吸收黑格尔哲学

中的抽象活动原则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基础上,从主客体关系出发来界定“实践”的科学内涵,从而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参见同上,第499页)这一内涵不仅透彻地表达了主客体的真实关系,还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找到了本体论根据。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理解既超越了一切离开“主体方面”去单纯地谈论“对象、现实、感性”的旧唯物主义学说,也超越了一切离开“客体方面”去任意发挥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唯心主义学说。(参见同上,第499页)另一方面,马克思确立了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马克思不仅要在理论上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同上,第4页),而且还在实践中把“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第11页)作为新的历史任务。正是在批判性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并揭示了这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人的统治、控制和奴役的内在秘密,进而提出必须从充满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把人解放出来的实践任务。与主张把“人”从哲学、神学、“实体”“自我意识”等抽象词句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完全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解放决不是思想活动,而是历史活动,而且“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同上,第527页)。同样,要使广大工人阶级从“现实的私有财产”的统治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参见同上,第232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紧紧围绕人类解放的实践主题,充分论证了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唯物主义学说正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来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与此相应,马克思在使用“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上,第502页)、“实践的唯物主义”(同上,第527页)、“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同上,第530

页)等相关概念时,也体现了其新世界观以变革现实世界为价值诉求的向度。

总体来看,“实践”在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追求的唯物主义学说中具有根本性地位。相对于费尔巴哈停留于“解释世界”的直观唯物主义而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为了配合这种思想转变,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了《提纲》中的哲学话语,大量使用了“现实的个人”“物质生活条件”“有生命的个人”“物质生活”“生产”“再生产”“物质活动”“工业”“工业和社会状况”“现实的运动”“现实的生活生产”“物质交往”“感性活动”“劳动”“物质实践”“世界历史”“现实生活过程”等话语,并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同上,第567-568页)这一新哲学的基本命题。由于哲学革命的完成,马克思也摧毁了费尔巴哈哲学及其话语的基本建制,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61-262页)。

通过扬弃思辨哲学话语、将经济学话语哲学化、甄别和放弃直观唯物主义话语,马克思创建了实践话语,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走出黑格尔哲学谱系及其话语。当然,哲学革命与话语革命的双向互动并不是完全同步的,相对于哲学革命,话语革命具有滞后性,因为哲学革命的完成主要是基于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而旧的话语也可以表达新的思维方式。因此,哲学革命的完成标志着话语革命的完成,但是在完成哲学革命后,还需要深化对话语内涵的阐释。譬如,“生产关系”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在《形态》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一方

面,马克思当时还无法把握生产关系的准确内涵,他仅仅从交换关系、交换形式的角度去理解生产关系,窄化了生产关系的内涵;另一方面,他还无法区分出“生产关系”与“交往形式”、“交换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因此,话语革命的深化是随着马克思将哲学革命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具体事件的过程逐步实现的。这也反映出思想创造的复杂性,既存在旧话语表达新内涵的情况,也有新话语表达旧内涵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阿尔都塞,2010年:《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 [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984年,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1984年,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
- [4]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 [5]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 [6]侯才,1994年:《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60年、1995年,人民出版社。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 [9]麦克莱伦,1982年:《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夷、陈启伟、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
- [10]文德尔班,1987年:《哲学史教程——特别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
- [11]吴婷,2021年:《〈巴黎笔记〉的书目线索与马克思的思考逻辑》,载《山东社会科学》第11期。
- [12]吴晓明,2001年:《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载《学术月刊》第9期。
-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2017年,外文出版社。